

地域性社区认同的构造与意义

——基于广州市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陈福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在一百多年来社区理论的发展中,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地域性社区共同体的存在与否成为了理论关注的焦点。当我们重新回顾关于社区空间的讨论时, 我们发现地域性社区的共同体, 实际上表达出的是社区认同的内涵。而在当代中国城市, 构造社区认同的因素有哪些, 这些因素对社区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哪些的影响,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

关键词: 社区认同; 地域性社区; 城市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332.1 **文献标识码:** A

一、社区理论的发展中的地域性社区

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 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社会联系的概念, 而这些社会联系则蕴涵了基于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团结、一种共同的情感分享模式以及对于合作的自愿态度等等。在这种社区观念中, 情感和生活被共同分享着, 并且个人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这样的社区观点, 我们可以回溯至滕尼斯的著作之中。滕尼斯把社区定义为地域范围狭小的、其居民具有较紧密的相互关系的、传统性较强的地方性社会, 把社会定义为大规模的、关系较松散的、现代性较强的社会, 列出了社区与社会之间一系列可互相比拟的性质[5]。实际上, 在我们现在关于社区的讨论中, 滕尼斯的社区标准往往只存在于农村社区。然而, 其关于亲密性的邻里和地域性的互动, 仍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话题而存在。

在早期社会学家的眼中, 社区的未来是不乐观的。滕尼斯对社区与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分, 本身就包含了对于人类社会结构发展的思考。社会将会取代社区, 而社区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 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他将城市背景及城市环境概念化为人口规模、社会心理环境刺激强度、社会分工、货币经济与理性等几个方面, 以此来论证城市背景和城市环境对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6]”。从齐美尔的分析中, 我们也可以得到社区中的地域性亲密关系将在现代社会逐步消亡, 而取而代之的则是非个化的、专门化的、没有情感关连的人际关系。以沃思为首的社会学者进一步继承了这种对“社区消亡”的观点, 他们认为“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 呈现出人口密度高、异质性强、社会组织发达等特点”, 这种观点与早期社会学者对于社区观点后来被综合为“社区失落论”。社区, 在社会学者的眼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即将远去的话题。

然而经验世界的发现, 却并非如“社区失落论”者的预期。在其后社区研究者中的现实观察中, 社区仍然具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其中以刘易斯(Lewis)和甘斯(Gans)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意义。刘易斯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社区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在这些移居者的社区生活中, 传统的人际关系仍然得到了保存。尽管身处城市化的大众社会中, 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小社会圈。由此, 刘易斯认为, 城市中大量人口、高密度及高异质性, 并不是造成人际关系恶化、社会秩序混乱、都市社区解体的必然因素[7]。而甘斯对波士顿西区意大利移民的生活进行研究后, 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更进一步认为城市问题及城市社区的衰败,

而是与城市居民的阶级、种族、家庭、文化、生活等背景相关的。而对于这种移民社区而言，社会歧视与种族歧视加强了社区对于移民生活的构建意义[8]。费舍尔的《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怀特的《街角社会》，利博的《Tally 角》等著作，都阐释了在城市社区当中，亲密的邻里关系仍然存在，城市居民仍存在地方性的社会联系，同时也利用着邻里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和获得各种社会支持。这种对于社区研究的发现和观点，被称为“社区继存论”[9]。

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提出了研究社区的新的视角——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他认为，前二者的立足点在于社区是直接和亲密关系相关联的，当个人的亲密关系已由地域性的社区向外蔓延或是依旧保留了下来，所以得出社区消失或继存的结论。而社会网络分析并不将群体或邻里边界作为真实的社会边界，他认为研究社区重点在于研究个体的社会网络与亲密关系，这些内容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构成了个体的“个人社区”。与此同时，他谈到，在一个家庭中，可能同时存在着“社区失落”与“社区保存”两种情况。对于一个儿子而言，处于“单身型”的结构类型之中，他的关系构成则是朋友关系为主的，并且比较分散，而对于居家的母亲而言，亲密的亲属、邻里关系则可能在其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10]。所以对儿子的社会网络而言，是一种“社区失落”，而对于母亲而言，则表现了“社区继存”。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韦尔曼的社区理论时，我们可以发现，其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将以往对邻里、亲密关系、地域性社区生活等传统研究范畴，转移到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探讨中来，社区，在其眼中，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个人关系网络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从未消失过，并且一直存在，只是在现代的社会中，个人社区的地域性特征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化，因此产生了“社区失落”与“社区保存”两种观点的对立和争辩。

韦尔曼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具有三种优势，第一这避免了人们必须整合于邻里、亲属群体以及其他限定性社会团结的组织这一假设；第二使得我们能够更广泛的研究社区这一范畴，包括从人际关系到世界体系的跨越；第三，这种视角使得研究技术得到了系列的发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让我们对于人际网络的存在、构成、结构以及操作都有了更好的发现和分析[11]。因此在研究者中，将以 Fischer ,Wellman 和 Leighton 等人的社区理论观点称之为“社区解放论”。

然而社区的地域性也不仅仅包含了物理空间的意义，也具有其社会意义。正如韦尔曼对自己研究不足的提出，人文地理学和一些社会学者强调了社区认同的观点。一个群体关系的空间是一个包含了意义生产的物理和文化的结晶，这种意义生产则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将人们与空间相联系，同时使得人们之间相互支持与信任的过程[12][10][9][11]。Aouest 与 Griffet 通过对法国南部大城市一个社区性公共公园的认为，作为一项社区设施的公共空间——公园，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以及同伴间社区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弥合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上，也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社区居民在这个公共空间中逐渐建立了社区认知的多种维度[12]。

Fraser 通过对美国新奥尔良州社区居民在大暴风灾难后的访谈后，他发现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在这种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表现十分强烈，而这一结果与当地政府在社区的制度安排和资源动员上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13]。Reynaud 对美国移民社区的口述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虽然新一代移民对族裔的历史和记忆并没有直接的体会和经历，然而有老一代移民在社区空间中对于认同与记忆的创造，使得新一代移民在社区的认同和交往上，保留了许多了传统的因素[14]。

那么如何在城市社区中发展中理解这种社区地域性的认同和归属呢？冯刚指出城市社区存在的可能性与人性有关。如果我们从个人的心理需求、心理体验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学的理性人概念出发，将会发现尽管城市社区不存在着利益关联，但对于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却有着重要价值，这样如果创造象社区成员之间的互惠这样的社会资本，就可能在成员中

建立社区归属感和共同利益[15]。这样我们可能理解到社区社会网络观点的地域缺失的一个问题，以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能够得到什么人提供的帮助来衡量社区关系时，往往带有了一种利益假设的观点。然而在一个地域性社区空间中，人们社区活动与交往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基于利益的考虑或是以利益、兴趣、情感为背景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正如 Delanty 和 Calhoun 所认为的那样，社区既非一种社会整合的模式，也非意义形式，而是一个包含归属感的开放式的系统，而社区需要被理论化为一种具有互动空间和归属感的社会联系[16]。因此如何重新认知社区，是社区研究者必须面对的复杂的课题。

二、社区认同与城市社会变迁

在当代中国城市的社区变迁中，从城市空间的拓展的角度上来看，这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第一，由于城市现代化，大量的商品房住宅社区开始出现，人们交往和活动的利益格局与之前的社区生活比较，有了较大的变化。老城市社区包括单位住宅社区，其社区层面的交往和活动都是在一种熟人社会的气氛中进行的，门对门，户对户的熟悉感是社区整合的重要基础。然而，商品房社区的出现，实际上大大改变原有社区生活的运作机制，邻里之间的陌生感，对社区事务以及共同利益的冷漠感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摆在社区工作者面前的难题，也是对社区整合这个重要课题的一大挑战。第二，城市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许多的原来的农村郊区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城市社区。作为改变不久的新的城市社区，其运作的机制上实际上既保留着传统农村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又兼具富有城市气息的体制和模式。如何理解和研究这种新城市化社区，也成为了我们开展社区研究的重点。

在实际研究表明，社区认同和归属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时间、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居民的社区满意程度。而在本研究中加了社区历史环境这个变量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不同的社区拥有不同的传统与历史制度环境，因此在分析其所具有的社区认同时，也应该有所区分，正如前文分析，这种类型学的区分，对我们更好的把握一个地域性社区的认同与归属的构造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利用了三个不同形态的社区进行研究，所以抽取的三个社区类型分别是：（1）珠村社区，位于广州市东端，是一个以三大家族姓氏为主体的自然居住聚落，2002 年改村委会为居委会，成为一个新城市社区。（2）逢源社区，位于广州市西部，自清朝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住户之间没有血缘或家族的连带，但居住历史多超过三代。虽然这个社区也是自然形成的居住聚落，面积很大，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个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范围，而这个街道则也包括了许多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3）新商品房住宅区，位于广州市西部，由几个大型房地产集团承建的几个新住宅小区，在 1990 年代中期建成第一期楼宇，至 2006 年共有在册住户已超过 1000 户。选择这三个社区分别代表过渡的、传统的和新兴的城市社区类型。在这三个社区已登记住户居民为基础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各抽取 300 位居民（18 岁以下、80 岁以上者剔除）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回收的有效问卷数分别 267、233 和 240；回收率分别为 89%、78%和 80%。问卷的问题涉及三方面内容：个人的社会网分布、对社区的认知和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本文将通过比较三个类型社区在这三个方面的数据差异来描述分析不同社区类型的特点、自然社区与行政社区的差别以及城市化导致社区的变化。

表 1 社区资源因子分析

项目	社区资源满意度	共量
社区环境卫生	0.810	0.656
社区治安	0.821	0.674
社区服务	0.861	0.742
社区活动场所	0.833	0.695
社区交通条件	0.687	0.472
特征值	3.238	3.238
平均方差	64.765%	64.765%

表 2 个人生活满意度因子分析

项目	个人生活满意度	共量
收入水平	0.777	0.604
工作	0.844	0.713
家庭生活	0.792	0.627
健康状况	0.624	0.389
特征值	2.333	2.333
平均方差	58.331%	58.331%

表3 社区参与因子

项目	社区参与程度	共量
社区志愿者活动	0.695	0.483
社区文娱活动	0.673	0.453
社区体育健身活动	0.574	0.330
社区慈善活动	0.599	0.359
社区教育培训活动	0.739	0.546
特征值	2.171	2.171
平均方差	43.421%	43.421%

表4 社区认同因子[17]

项目	社区认同	共量
社区建设我也出了一分力	0.509	0.259
参与社区事务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职责和义务	0.713	0.509
社区组织的活动对我及我的家庭发展有较大作用	0.564	0.318
我会尽可能参加社区里各种选举活动	0.690	0.476
我很关心报纸和电视我们社区的报道	0.724	0.524
特征值	2.085	2.085
平均方差	41.703%	41.703%

如表 1 所示,我们将社区资源的项目(包括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活动场所、社区交通条件等项目)的量表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出社区资源满意度的因子,为了便于分析,将因变量“社区资源满意度”转换为 1 到 100 之间的指数。转换的公式为: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 $A=99/(\text{因子最大值}-\text{因子最小值})$, $B=(1/A)-\text{因}$

子最小值[18]。同样的，在表 2—表 4 中，我们将个人生活满意度、社区参与、社区认同都做了一样的因子分析处理，从纳入到我们所要研究的项目中来。

表5 城中村社区环境下社区认同多元回归分析

社区认同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邻里关系	3.892	0.154	2.550	0.011
社区参与	0.105	0.114	1.675	0.000
社区资源	0.263	0.252	4.842	0.000
城中村社区 ^a	0.120	0.214	4.131	0.000
小学 ^b	4.816	0.092	0.765	0.445
初中	3.143	0.068	0.509	0.611
高中	3.698	0.095	0.612	0.541
大专	5.412	0.132	0.876	0.382
收入	0.002	0.001	2.655	0.008
年龄	0.072	-0.068	-1.516	0.130
居住时间	0.044	0.015	5.509	0.003
生活满意	0.035	0.056	1.463	0.144
性别	0.037	0.022	0.607	0.544
常数	0.072		5.509	0.000

注：Adjust R²=0.146, F=5.884,P<0.05

a 参考类别为“老城区、新商品房社区”；b 参考类别为“没上过学”

对于基于历史制度环境的第一个模型（城中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比较）分析的如表5所示。首先我们看到居民的一些个体特质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在方程中，收入和居住时间对于社区居民的认同与归属呈正相关，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这些因素并不构成影响。格尔森等人认为，居民年龄与其社区归属感呈正向相关关系，因为“经济地位和年龄影响居民本身在其社区的独立性以及参与其整个社区与地区活动的机会” [19]，而在我们的研究里，年龄并不构成影响因素。事实在格尔森的观点中，年龄的标准实际上代表了在一个社区中个体在时间这个维度上积累了社区生活的经验和营造了自身的社会网络，从而更加具有认同和归属。而当我们把居住时间引入方程时，年龄的作为自变量的影响就消失了。因此对于社区居民认同与归属来说，在一个社区内的居住时间才是真正的影响因素，而年龄对社区认同和归属的影响也是通过居住时间来表达的。而教育因素在我们的方程中，影响也不显著。Stinner和Loon的研究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给居民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而社会机会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将影响到人们的社区归属感[19]。在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认同的两个指标——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中，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经济收入呈现出弱相关性。单菁菁对北京市社区居民社区归属感的调查中，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弱(r=-0.10412)，未达到任何可接受的显著置信水平。她认为在我国城市社会之中，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区归属感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考虑到统计口径与数据的差异性，基本印证了我国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归属和认同并不具有重要影响这个一观点。

表6 老城区社区认同多元回归分析

社区认同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邻里关系	1.272	0.096	1.666	0.007
社区参与	0.371	0.222	4.031	0.000
社区资源	0.159	0.203	3.410	0.001
老城区 ^a	2.687	0.136	1.974	0.014
小学 ^b	2.325	0.069	0.782	0.435
初中	3.594	0.147	1.278	0.202
高中	2.272	0.112	.820	0.413
大专	3.643	0.175	1.220	0.223
收入	0.001	0.017	1.944	0.003
年龄	0.004	0.006	0.087	0.930
居住时间	0.016	0.081	1.086	0.027
生活满意	0.605	0.031	0.550	0.583
性别	2.325	0.069	0.782	0.435
常数	39.967		6.900	.000

注: Adjust R²=0.159, F=5.547, P<0.05

a 参考类别为“新商品房社区”; b 参考类别为“没上过学”

在社区要素方面,社区关系、社区参与、社区资源这些因素,对居民社区认同和归属产生了影响。其中在两个方程中,社区资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252 和 0.203,影响作用较为显著。社区资源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对于一个地域性社区而言,社区资源所代表的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会对社区居民居住的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Kasarda 和 Janowitz 提出,如果社区条件不能够满足居民的希望和要求,就影响到居民是否愿意留在这个社区居住[20]。Gerson 认为,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等将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到他们是否愿意在此社区居住[21]。而在本研究中,社区资源的满意程度不仅仅是是对社区居民居住意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另一方面,邻里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由邻里关系代表的社区社会关系也对社区居民的认同和归属有重要作用。这说明了良好的邻里关系,更能促进社区居民形成地域性社区的意识,这也与传统社区研究中对于以邻里关系为主题的社区关系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而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的认同与归属也具有正相关关系。在许多研究中,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往往是具有相互效应的两个社区因素。社区居民越频繁的参与社区的事务与服务,他们越容易感知到社区在于其生活中的意义,越认同于自己的社区和依恋自身所在的社区,同时,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越具有认同与归属,其本身在情感维度,对地域性社区生活就越不显示出排斥性,越容易参与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由此,作为心理层面的社区,社区认同与社区归属,在很大程度上,由社区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所决定:社区资源、社区社会关系以及社区参与。

最后,通过统计分析,不同的社区历史环境变量,都对社区认同变量产生了影响,从结果上显示,城中村社区的社区认同要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社区,而老城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则高于新商品房小区。然而对于不同性质的社区来说,分析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新城中村社区居民而言,在实际的生活中,其社区不仅仅具有一个生活地域的意义,在其经济生产、政治参与、社会交往方面,都提供了各种制度性的保障和福利。所以他们具有较高的社区认同和归属这一结论是不难理解的。而对于老城区社区来说,由于其所在社区,事实上,具有单位组织的同一性,即社区生活本身属于单位生活的一部分和“八小时之外”的延展,那么认同于其单位,也在就是认同自身所在的社区。同时单位组织提供了社区成员的生活中

所需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个也具有保护性的社区历史环境，使得社区居民对于自身所处社区更加认同。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社区的认同与归属感与社区资源和历史制度环境具有相关关系。同时社区资源越丰富，社区成员对于社区越具有认同和归属；由于社区的历史制度环境不同，社区成员对于社区认同和归属具有差异性。当社区历史制度环境对于社区居民生活，越具有保护性意义时，社区居民对所处社区越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我们可以将不同的对于社区认同研究中的模型综合，在中国社区建设中，得到如图 1 所示的关于社区认同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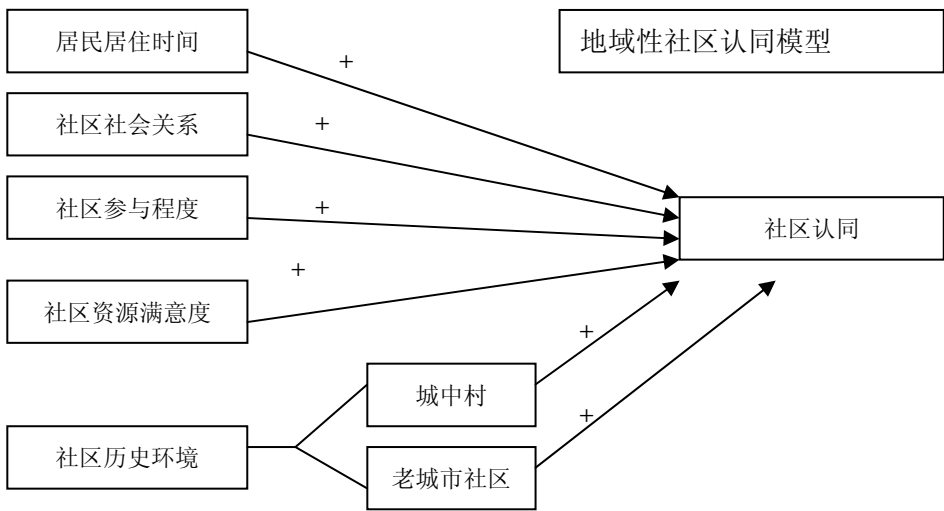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社区要素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当我们审视地域性的社区空间时，内在于这个空间的要素，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空间距离问题，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互动系统。首先从历史制度环境的角度上来说，由宏观社会结构的所引发社会历史制度环境的变迁，对社区的塑造作用是很大的。不同地理条件，不同人口构成，不同文化环境，不同社会生活的社区，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这一切正是社区所属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社区成为更大社会的缩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社区生活之中。美国社区研究者 Warren 的这段话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

可以肯定，社区之间在价值观、准则、主导利益、方式和其他文化方面有区别。但如果观察一个人在繁华街道角落、超市、或自己家、或体育时间的公开行为，他会很难知道这人是在匹兹堡，而不是圣路易斯；是在布利奇波特而不是洛克兰；在亚特兰大而不是丹佛。确实思想系统、当地性的观点和行为模式本质是重要的，但一个来自火星的观察者将被它们跨越国家的出奇的相似性而震惊。这再次表明，它们最好被认为是国家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系统在当地的制定或实现[22]。

所以历史环境是我们在社区研究和建设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涉及到更大的社会政策的创造和实践性的空间。其次，社区资源是社区中作为物质层面的重要因素。当我们标识一个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时，首先是从社区的地理、建筑、设施、服务等因素上进行的考虑。这就意味着，社区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名称或者符号，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种存在，给予了社区居民富含多样性的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缺乏了必要的资源要素，任何社区的建设都无法上升到一个更高、更好的水平。第三，作为社区心理层面的社区认同感。我们看到，

对许多人来说,当地社区不仅仅是一个他们睡觉的地方,而同时也作为一个对他们生活起着作用的地方、朋友居住的地方、投资的地方、孩子受教育的地方等等。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世界主义者,有的人仍然是地方主义者,而更多的人则是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对于地域性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则塑造着这种“地方感”的重要心理机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了社区认同,社区对于居住其内的个体而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Just a place, not a community”。所以,本文认为,历史制度环境、资源、社区认同是构成地域性社区的三个基本要素。

参考文献

- [1] 黎熙元. 现代社区概论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 [2] 张应祥. 社区、城市性、网络——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研究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6 (5): 184.
- [3] 单菁菁. 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4] 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 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 [5] 夏建中.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2000 (8): 21-26.
- [6] Wellman, B.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y [A].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C]. Beverle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2. 70.
- [7] Wellman, B. The Network Community: An Introduction [A]. In Wellman ed.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C]. Boaldes: Westview Press, 1999. 17-18.
- [8] Lepofsky, Jonathan & Fraser, James., Building Community Citizens: Claiming the Right to Place Making in the City [J]. Urban Studies, 2003, 40(1): 127-142.
- [9] Fraser, James. Lepofsky, Jonathan. Kick, Edward & Williams, J. Patric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and Limits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y-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 Urban Affair Review, 2003, 38(3): 417-445.
- [10] Martin, D. "Place—framing" as Place-making: Constituting a Neighborhood for Organizing and Activism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3. 93(1): 730-750;
- [11] Mitchell, D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M]. New York: Guilford. 2003.
- [12] Aouest, O & Griffet, J. Public Space and Community [J], Space and culture, 2004, 7(2): 173-187.
- [13] Fraser, J. The Relevance of Human Geography for studying Urban Disasters [J], Space and Culture, 2006, 9(1): 14-19.
- [14] Ana Teresa Jadin Reynaud, The change of Community: Local Memory of Immigrate [J], Space and Culture, 7(1).
- [15] 桂勇. 2005, 城市“社区”是否可能? ——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12-18.
- [16] Delanty, G.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57; Calhoun, C, 1998, Community without Propinquity Revisite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pace [J], Sociological

Inquiry.2003, 68(3):373-397.

[17] 社区资源, 个人生活满意度, 社区参与, 社区认同各项内容均使用 Likert 量表法进行测量.

[18] 边燕杰, 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M].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1, 2.

[19] Gerson, Kathleen, Attachment to Place[A]. In Fischer Claude S ed. Networks and Places[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20] Stinner, William F. and Loon. Mobile.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J]. Rural Sociology,1990(55):12.

[21] Kasarda, John and Janowitz, Morris.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J].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74(3):39.

[22] Gerson, Kathleen. Attachment to Place [A]. In Fischer Claude S. ed. Networks and Places[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23] Warren, Roland. The Community in America [M]. Chicago: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1978.419.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of Geographical Community Self-identi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Urban Community in Guangzhou

CHEN Fu-p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theories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whether there is the geographical community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life is the main focus. With reviewing those previous discussions about community space, we find that the real meaning of geographical community is community self-identity. We mainly analyze those factors in modern cities of China which affects the community self-identity. And what changes they will bring abou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y Self-identity; Geographical Community; Change of Urban Community

收稿日期: 2007-0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5&SH042);

作者简介: 陈福平(1982-), 男(汉族),福建南平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